CHINA STUDIES

No.14

中国研究

2011年秋季卷总第14期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本期焦点：中国农村研究

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体系
——以我国农产品市场为例　熊万胜

由礼而法：土地流转的社会分析
——基于皖南祁村的调查　马流辉

辞工：民工荒背景下的新型劳资冲突　彭铟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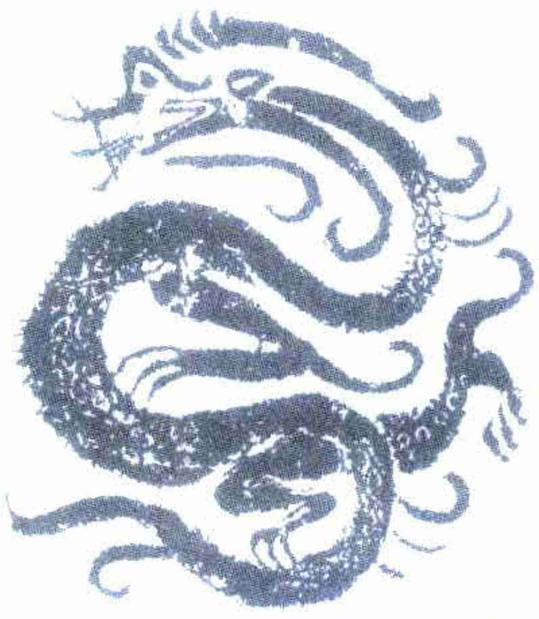
坐立不安：香港中产的社会心理状况　吕大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研究

CHINA STUDIES **No.14**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研究.2011年.秋季卷:总第14期/周晓虹,谢曙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97-3764-4

Ⅰ.①中… Ⅱ.①周…②谢… Ⅲ.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现代-丛刊 Ⅳ.①D66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8298号

中国研究(2011年秋季卷总第14期)

主　　编/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责任编辑/许玉燕　刘德顺
电子信箱/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李瑞芬
项目统筹/童根兴　　责任印制/岳　阳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25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字　　数/275千字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3764-4
定　　价/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Goodman, David（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　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　宏（新加坡南洋大学）
马　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 (美国哈佛大学)
乔　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乐天（复旦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德睿
杨渝东
陆　远
朱安新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中国研究
2011 年秋季卷
总第 14 期

目　录

发刊词 …… / 1

主题研讨：中国农村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 …… 张玉林 / 1

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体系
——以我国农产品市场为例 …… 熊万胜 / 3

由礼而法：土地流转的社会分析
——基于皖南祁村的调查 …… 马流辉 / 35

中国的城市化与失地农民
——以苏北某市郊区为例的人类学研究 …… 王　华 / 49

辞工：民工荒背景下的新型劳资冲突 …… 彭铟旎 / 61

论区域比较作为方法及其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 …… 刘燕舞 / 83

学术论文

坐立不安：香港中产的社会心理状况 …… 吕大乐 / 105

日常歌唱与文化认同：纵观横看马来西亚华人 …… 黄美冰 / 120

于无声处的田野体验：文化人类学视角中的

上海聋人手语实践 …… 潘天舒　张梅胤 / 136

“姊妹”并不平等

——基于一个东北农村女基督教徒的研究 …… 李　鹏 / 155

人口控制论如何获得学术权威？ …… 金度经 / 174

阶层同质婚刍议 …… 孙　陶 / 193

书　评

传承抑或断裂：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与代际关系演变

——以 1994 年保定家庭调查为例 …… 曹慧中 / 204

殊途异类：亚洲新富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意识

——读《亚洲新富：手机、麦当劳与中产阶级革命》 … 李婷玉 / 217

英文目录与摘要 …… / 231

稿约 …… / 237

主持人语

张玉林*

迄今为止，《中国研究》编发了多期农村研究专题。与以往的研讨内容相比，本期的专题论文集中于“结构”，以及结构中的人。熊万胜的论文考察了“体系”一词自改革以来逐渐变成常用政策术语的过程及其意蕴，认为它的流行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标志着社会系统的不均衡。他把农产品市场体系理解成一种“体系性的社会结构”，通过梳理发现了其三个特征：中央对地方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集权；政经关系的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同时要在市场和“官场”中生存的农业企业。在这个受到行政机构强力引导的体系中，农业企业积极地从行政体系获取资源，政府也越来越依赖企业，而农民集体和农户则被边缘化了。

边缘化或“体系”化的后果是什么？马流辉对皖南农村“土地流转”的分析呈现了一种可能性。他将调查村的土地流转形式归纳为“礼俗式的”和“法理式的”，前者发生在劳动力流出后的农户之间，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伴随着长久的广义互惠关系，是内生性的和容易接受的；后者则由政府推动，以法律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农户与资本之间，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看似具有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却因为企业的趋利倾向和转嫁风险动机而危及“被流转”农户的利益，同时也挤压了留守农户的就业空间，对乡村秩序构成一定威胁，并由于必然改变土地的用途而促成宏观层面的粮食安全风险。这样，包含有对农业的“规模效应”乃至“农业现代化”等巨大期待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就不能不被慎重对待。

王华的论文也提供了另一种形态的边缘化后果。通过对苏北某市城郊

* 张玉林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yulinzhang@ nju. edu. cn）。

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的人类学调查，他呈现的是一幅充满矛盾的但似乎也并不意外的图景：权力和资本合作推进的造城和造楼运动，同时也造就了新的城市贫民窟。为了还债和生计，失地的青壮年农民被迫远去打工，而在拆迁安置楼旁漏雨的平房里，蜗居着无力购房的贫者和老弱病残。废旧板瓦搭成的棚子、烟熏火燎的地锅、发臭的污水河，以及亲友的四散和消失了的邻里关系，预示着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被高度挤压，处于无奈的“阈限”（liminality）之中。

当然，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结构在形成，既有的结构也会松动或变形，而这有赖于互动或外部环境。彭铟旎的《辞工：民工荒背景下的新型劳资冲突》即为例证。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与其雇工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考察，作者发现，“民工荒”改变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增强了工人的议价权和斗争勇气，使他们敢于挑战管理者的权威，迫使资方改变管理体制，更多地利用间接和隐性的方式实施控制。不过，这种控制表现为“形式上较为松散但实质上更为严格”。而正如作者也注意到的那样，劳动力供不应求时期劳资关系的有限松动是否会延续下去，而一旦供大于求重现时，资本的绝对地位是否又会重新崛起，显然是个问题。

刘燕舞的论文所涉及的结构主要限定在农村内部。与已有研究的整体性论述不同，他运用以村庄为基础的区域比较法，基于对多个村庄的历时性调查统计数据，分析了南方、北方与中部农村自杀现象的演变、区域差异，及其与背后的社会整合、社会规范演变之间的直接关联。他发现，三十多年来农村自杀率的变动在南方表现为抛物线形，在北方近似倒抛物线形，在中部则一直走高；2000 年以后，三大区域青年女性的自杀率均显著下降，而老年人的自杀率总体上升，其中中部地区的上升特别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结论：随着老年人这一原有结构中的强者在新的结构中成了弱者，南方和北方农村也正在向着中部看齐，也即老年人的“自杀潮”正在抬头或加快形成。

在上述种种结构及其变动之外，有必要注意传统的农村研究曾经高度关注的另一种结构，即城乡关系。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刚刚过去的 2011 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比例开始低于城镇人口的比例，绝对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相对少数。而“少数”的权利是否会得到尊重、其境遇是否会得到改善，抑或一如既往地与其从前作为多数的时候一样，甚至更糟？这显然需要今后的农村研究当作一个问题。

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体系

——以我国农产品市场为例

熊万胜*

摘　要　本文认为，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农产品市场理解成一种“体系性”的社会结构。其中国家权力机构构成了体系结构的中心；权力与资源的富集程度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从中心到边缘之间可能有多个层次。农产品市场作为一个体系可以体现在关系、制度和场域三种结构上。这种体系的概念在西方社会理论的脉络里，可以理解为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基础，尤其是要在政治组织之外寻找到社会组织的基础。体系概念不仅有社会理论的渊源，更有显明的政策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体系”一词从一个几乎从不使用的提法，逐渐变成一个越来越常用的政策术语，这种文本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社会结构的突生。

关键词　体系　农产品市场　中心—边缘结构

根据经济社会学的一般观点，我们可以把市场理解成某种社会结构，本文进一步认为，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解释为一种“体系性”的社会结构。体系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它遍布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从世界体系到一个村落的空间结构。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以民族国家为范围的体系，它一般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的结构特征：国家权力机构构成了体系的中心；权力与资源的富集程度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从中心到边缘之间可能有多个层次。之所以体系可以创生秩序，是因为体系既是一个中心

* 熊万胜博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wshxiong@ hotmail. 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边缘的控制结构，也是一个中心对边缘的资源流动结构，形成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的依赖性，并通过这种主体之间的依赖关系，使资源的流向和流量可预期性提高。

国家规模上的体系并非只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必然结果：国家自主性的上升。在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里，国家在社会系统中都越来越不只是一个结构，它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行动者，占据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地位，使得社会结构的权力分配更加非均衡化。体系以及体系带来的秩序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中的诸种体系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农产品市场体系，这种体系在中国社会系统中也有一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们要分析这种体系结构是否只是农业市场领域中的特例，它的出现在中国社会系统的宏观变迁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指示性意义。

一　一个多维和多层次的中心—边缘体系

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根据洛佩兹和斯科特（2007）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把体系的结构分为关系结构、制度结构和场域结构三个层面。要完整地解释这三个层面，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建筑物来说，它使用的各种建材都有自己的位置，其中的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结构；制度结构是这个建筑物的图纸，它为这些建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规定了什么材料为什么要放在什么位置，以及怎样是正常的状态，怎样是需要维修的状态；而场域结构描述了建材之间的力学关系，哪根柱子最重要？哪堵墙是承重墙？不同方向的力是如何搭配的？如此等等。但所有这些结构都处于同一个建筑物中。

在制度、关系和场域之间，市场体系首先是一种关系结构，它描述的是一种中心—边缘关系。洛佩兹和斯科特不可能谈到中国式的市场体系，但他们谈到了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认为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关系结构，因为它标识出了各个国家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位置。我们要分析的市场体系也是这样一个不均衡的中心—边缘结构，它要标识出的是农业行政体系和各种企业以及其他市场经营主体在农产品市场中的位置。

1. 市场体系的四个维度

各种市场主体在市场上的不均衡位置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或者换一句话说，农产品市场体系是一个多维的中心—边缘结构。以管理粮食业务

的领导机关为中心，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四个维度的多层次中心—边缘结构。

（1）农业行政管理相关机构的科层体系。

政府科层体系内部存在着行政级别的高低不同，企业享受的扶持政策也比照行政级别分出等级，这两个等级秩序现在被捏合在一起。行政科层是最重要的维度，没有这个维度，也就无所谓中心—边缘结构。在现有的税制和干部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抓农业缺乏积极性，农业工作需要自上而下地加压和诱导。所以，接近权力中心的方便程度是企业得到重视程度高低和扶持力度大小的一个主要依据。

（2）企业或农户所经营的产业和产品的类别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存在着“轻重缓急”之分。

国家会在不同的时期赋予不同的产业以不同的重要性，对农业的重视比较一贯，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每年中央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农业和农村工作。但国家的重视程度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有所下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徘徊不前。从 1998 年到 2003 年粮食产量多年下滑，以及农村社会矛盾突出，国家又重新提高了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在 2003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加大力度推进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2004 年再次把“三农”工作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体。因此，农业领域里的企业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国家开始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在大农业的内部，不同产业在政策序列上的位置也有所不同。由于粮食始终是农业的重中之重，所以，种植业的地位始终高于林业和其他产业。中央在 1997 年的机构改革中撤销了林业部，改设国家林业局。在种植业内部各类农产品的地位也不同，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地位显然更高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它们属于一类物资。粮食从 1953 年开始成为统购物资，1954 年棉花成为统购物资，1957 年油料也成为统购物资。直到 1985 年取消了粮食统购，但在改革中仍有反复。尤其是 1998 年粮改过程中一度实行了市场封闭运行，禁止私商。到 2004 年国家才真正全面放开了粮食的市场化经营。棉花的市场化经营放开也是渐进的：1999 年才放开价格，2001 年才允许自由收购。在粮食内部也有轻重不同，比如大豆市场对国际市场开放得最为彻底，这与它既是粮食作物又是油料作物的性质有关：作为粮食作物，它不是主粮；作为油料作物，它的替代品较多。

必须补充的是，这是全国的一般情况，各地会因地制宜提出自己的要求。国家也会根据全国农业区划的总体安排应对各地的差异化需求。

（3）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存在中心—边缘差别。

比如，在粮食流通领域里，国有粮食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被称为是主渠道，而其他所有制企业被称为辅渠道。国家要依靠国有企业控制粮源，建立巨量储备，控制批发市场。在各类国有粮食企业中，中央直属的四大企业是最重要的。国家赋予中储粮公司和各地储备粮公司垄断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权；授予中粮公司控制进出口贸易的权力；授予华粮物流公司主导北粮南运的权利和义务。它们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近几年来，老牌的纺织业央企中纺集团也加入到粮食进出口贸易中。

（4）企业或农户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存在着中心—边缘的差别。

生产环节应该是农业产业链上最重要的环节，所以，在我国《农业法》规定的粮食安全战略里，第一条就是要保护耕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然后是强化主产区建设，这是国家粮食战略的基本盘。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水利，对于粮食生产来说，这也是在支持生产环节。除此之外，国家还建设有一批大型的国有农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农垦企业、华侨农场、国有林场、地方国有农牧渔场等。这些农场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农场往往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比如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310）的数据表明，黑龙江垦区拥有耕地近 3600 万亩，是中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2010 年垦区粮食总产量达 363.6 亿斤[①]。在流通环节里，也存在着轻重的不同。从中央粮食行政部门的视角来看，批发比流通重要，所以我国全国性的批发市场大多数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粮食的收储要比加工重要，在改革过程中把前者称为国有粮食部门的主营业务，把后者称为附营业务。对于从事主营业务的收储企业国家抓得比较紧。一个表现就是，在 2004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比较激进的产权改革方案，认为对具备收储功能的小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采取改造和兼并，或租赁、出售、转制。但在 2006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对小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只提到可以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合作、资产重组、授权经营等形式放开搞活；并要求规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于从事附营业务的加工企业，政策却放得比较开，民营化程度比较高。国家粮食局的统计（2010）表明：2009 年，在全国 14472 家主营粮食加工的企业中，有 13194 家非国有企

① 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1 - 03/08/c_ 121164000. htm。

业，占91%；而且企业规模大、日产400吨以上的企业有1060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只有83家。

以上所列只是最主要的四个维度，其实还可以分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不同。但本文在分析农产品市场结构时，主要是考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主产区只有作为一级政府来表现时才能成为行动者，这可以部分地归入到政府层次的变量中去。国家还很看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制定扶持政策时，把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在扶持时还要参考企业是否具有出口的能力。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出口能力属于企业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本文主要考虑的是宏观的结构变量。

笔者将以上提到的四个维度和多个层次示意如下。在下文的构图中，笔者参考了布劳（1994：14－15）的宏观维度设置方案。他区分出三种结构性参数，分别是类别参数（nominal parameters）、等级参数（graduated parameters）和交叉参数（intersection parameters）。为了更简单地叙述，这里主要采用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类别参数指的是分类对象在类别上的不连续分布，等级参数指的是在一个连续等级上的分布。在图1中，产业分工、技术分工和空间分布以及所有制分类都属于不同维度的类别参数；而

图1 农产品市场体系示意图

与政府层级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营主体的级别则是典型的等级参数，刚好把它们放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由于粮食是最重要的农产品，所以，在指标细分时，本文以粮食产品为例，比较详细地展示了粮食的种类。

在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中，突出了市场结构的三要素：市场份额、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应该说这解释了市场的关系结构中最为基本的一些方面，但显然不是全部的方面，图1列出的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着更为细腻的权力—资源结构。

2. 市场体系的三个层次

这个体系不仅是多维度的，而且也是多层次的。在多个维度和多个层次的交织下，每个行动者在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获取官方资源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能力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以国家领导机关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熊万胜，2011）。我们可以把这多种多样的层次分为三类：农业行政体系与法人行动者之间的差别，法人行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法人行动者与自然人（农户或个体户）之间的差别。在权力等级上，这是一个从强到弱的连续序列。

其中，我们规定，与分管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农业行政体系是这个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核心或中心结构，有级别的、受到政府扶持的市场经营主体是中间结构，而农民集体、没有级别的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是边缘结构。这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实际的层次要更丰富，在每一层的结构里都有很多的次级层次。

二　制度与场域结构中的强大权力媒介

关系结构与制度结构是混合的，它们的区分只是观察者观察角度不同的结果。从制度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体系的意义在于，这种中心—边缘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被想象的结构，而且它已经被制度化了，具有规范行动者的能力。进一步地，它存在一个可以被分析的制度结构。

1. 从文化主导的制度化转向权力主导的制度化

在图1中，市场经营主体存在产业分工、技术或市场空间区位的不同，这种分类首要的内涵并不是社会化的制度，而是生态系统或者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差别。比如农业产业分工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动物，要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了农、林、牧、副、渔以及主食、副食、佐餐品、零食和调味品等分类。这种分类的出现，与政府的安排没有关系。所谓的产业分

工，其实是生态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从生产到储备到加工和零售这样的分类是社会分工的表现，产区和销区也是分工的区域化，它们的出现也不一定是政府的安排。但是，这些分工结构都被国家权力制度化了。

在传统的社会里，无论是产业分工还是市场分工都可能被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核心变量是文化。比如我们说社稷，就是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土地神和五谷之神，不仅国家要设庙祭祀，各个村社都会设立神庙祭祀。从这种祭祀的对象和顺序中，我们可以理解农业和粮食在农耕文明中的文化内涵。当然，国家也会赋予它权力的内涵，比如重农抑商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农桑、限制工商来确保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以求天下太平。在市场结构中也存在传统的制度化方式，所谓的乡村共同体，在那些宗族比较发达的地区，也许主要是指聚族而居的村落，但在四川、湖南和长江下游地区，也许主要指的是初级市场。人们的交易、婚姻、祭祀和文化娱乐都要在这个范围内发生，继而通过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大，建立乡村社区与远方包括国家的关联（施坚雅，1998）。反过来，国家还要利用这种制度化的市场体系来延伸自己的权力，形成所谓“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2003）。

到了现代社会，这个制度化过程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行动者发生了科尔曼（2008）所注意到的，从自然人为主转向法人行动者为主。其次，原来的制度化主要是发生在一些科尔曼所谓的“原始社会系统”中，现在，这种制度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原始社会系统渐渐丧失了对生态系统和市场体系再制度化的能力。再次，国家权力替代了文化成为制度化的主要推动力。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施坚雅和杜赞奇对于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分析，是认为市场结构具有社会功能，是市场结构架构社会结构的看法。这在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是说得通的。但在当代，传统自发的市场结构已经被外来的力量深深地改造甚至架构了。尤其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力度大大增强，对于农业发展的干预力度特别强大。这种国家干预力度的增强，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共性，它主要有三个推动力。

首先，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风险，越来越需要一个公共权力机关进行协调，保护市场的运行。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出现的（波兰尼，2007）。

其次，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大都民主化了，民主政府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它必须确保人民的农产品安全，因此使得农业具有更加鲜明的公共产业的性质。对于公共产业，尤其不允许出差错。因此，政府必然要介入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